



上图 1986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在四川成都听取杨汝岱同志汇报工作。新华社发



右图 2013年1月1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这是习近平同志与杨汝岱同志握手。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1983年,杨汝岱同志在四川省邛崃县(现今为邛崃市)黑虎村养兔专业户邢春林的家里,同群众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 吴祖政摄



1989年10月,杨汝岱同志(右一)在四川农村考察粮食生产。新华社发



1992年2月18日至23日,杨汝岱同志率四川省代表团到广西沿海沿边地区考察。新华社记者 衡志诚摄



1996年3月8日,杨汝岱同志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新华社记者 刘建国摄

# 杨 汝 岱 同 志 生 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农业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杨汝岱同志,因病于2018年2月24日17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杨汝岱同志1926年12月出生于四川仁寿。他青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1950年1月参加工作,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月起,先后任四川省仁寿县富家区工作员、青年干事、组织干事,县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组长、队长。1952年5月起,先后任四川省仁寿县方家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1954年11月起,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1970年4月起,先后任四川省仁寿县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仁寿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和批斗,他仍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坚持真理,对党忠诚。针对四川省大部分农村不适宜大面积种植双季稻,而当时又要求将稻麦两熟改为双季稻加一季旱作的情况,他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实话,通过详实调研和深入实践,大胆提出并实践了“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三季总产900斤不如两季总产1000多斤)的粮食生产改革措施,得到省委的采纳并推广,为提高四川粮食生产提供了经验。他从实际出发,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对仁寿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状况,带领全县干部群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修建了被誉为“川西第一海、成都后花园”的黑滩水库,水库蓄水3.6亿立方米,为上百万人提供生活生产用水,结束了当地用水严重短缺的历史,为全县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是四川省当时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他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深入农业第一线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在基层经历了多个工作岗位的扎实历练,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培养了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

1977年3月,杨汝岱同志任中共四川省委地委书记、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同年12月起,先后任四川省委革委会副主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省委书记处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委常务书记。他主管农业农村工作,参与领导了四川农村改革,在全省大力推行“放宽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方针,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到组、到户的责任制,纠正一些地方对群众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纠偏”的做法,为四川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为全国的农村改革提供了经验,作出了贡献。

1982年12月,杨汝岱同志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1992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他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团结四川省委一班人,带领四川人民艰苦奋斗,实干苦干。他时刻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强烈的革命

事业心和责任感,经常深入到边远贫困山区、民族地区调查“温饱工程”的落实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一道探讨脱贫致富大计。他走遍四川的山山水水,全省217个县(市、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大量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大胆进行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提出了省委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城乡一盘棋、工业两手抓、农村三句话”,即把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包括乡镇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一盘棋来统筹考虑;工业上一手抓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手抓发展乡镇企业;农业上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主持谋划了“依托两市(成都、重庆)、先抓两线(沿盆地内两条主要交通干线的市县)、开发两翼(川东三峡库区和攀西川南资源区)、带动全省经济上台阶”的区域经济战略布局。针对四川的地缘特点,开展了“盆地意识”大讨论,提出并实行了“借船出海、借边出境”的对外开放方针。在他的倡导下,川、桂、滇、黔、藏五省(区)和成、渝两市联合起来,共建出海大通道,联合走向东南亚,坚持完善了定期召开经济协调会的制度,得到中央大力支持,推动了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开放合作。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和方针符合四川省情,对四川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始终高度重视,特别关注广大丘陵地区农民解决温饱以后的致富问题。他对扶贫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改变四川农村的落后面貌,1984年主持召开了秀山会议,正式提出开发扶贫,并推动设立了“四川省黔江地区”,为探索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新路子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还主持开展了发展林业、生态保护、县级综合改革、农工商一体化等工作。这些工作对四川的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始终把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记挂在心上,经常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

1993年3月、1998年3月,杨汝岱同志相继当选为政协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为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领全国政协视察调研团,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深入基层,重点视察了农业生产、京九铁路、兰渝铁路、扶贫开发、水资源保护及利用、农业生态环境和农村经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等重大问题,推动了南昆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向中央提出了很多有分量的意见建议。1994年,他对10多个省市的农村调研后,针对影响农民积极性和农村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交了《切实保障农民利益,认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调研报告,受到中央高度重视。1999年,他通过赴吉林省视察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情况,建议将吉林省作为全国生态建设试点省列入环保总体规划,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环保部门认真论证,及时将吉林省纳入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保护“北大仓”、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疾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1997年率团赴陕西省视察扶贫工作后,协调中国扶贫基金会向榆林

地区捐献了大量物资和款项,解决了当地部分群众吃水困难问题。2001年,他牵头组织全国性县乡公务员工资发放问题调研,历经9个月,赴6个省区市,先后形成《关于确保县乡干部工资足额发放的建议》,《确保县乡干部工资足额发放必须从体制上采取措施的建议》,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推动全国范围内基层公务员工资发放问题从体制上得到了解决。他积极促进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坚持求同存异原则,主动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合作共事,广泛团结和联系各界人士,参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和海外联谊工作,努力推动人民政协的制度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开创人民政协事业新局面,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汝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汝岱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具有坚强的党性,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高度评价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衷心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他勤于学习,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他作风民主,宽厚待人,团结同志,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情系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诚心诚意帮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杨汝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杨汝岱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上接第一版)

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一体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国家战略与规划、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区域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环境政策、开放政策等协同配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这几年,宏观调控与简政放权同步推进,与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关键领域的改革与各种调控工具灵活运用相互配合,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政府服务不断优化,新兴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创新创业热潮喷涌,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宏观调控为改革赢得了空间和时间,改革又提升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和水平,二者统一于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经济治理能力的提高,相互联系,相得益彰。

### (三)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表述,是我们认识理解新时代经济治理的一把钥匙。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当初,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逐步引入和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更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循序渐进过程。在经济转轨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由于各类市场主体日益活跃,各种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市场规则又没有确立,宏观调控要在巨大、复杂而又急剧变化的系统中实现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其难度比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要大得多。

过去几十年,我国发生过数次经济大起或大落、市场过热或疲软,宏观调控疲于应对短期失衡:每当经济下行、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便扩张总需求;每当市场过热、总需求过多的时候,便紧缩总需求。这种针对总量、偏重需

求侧、以“收放”为主要特征的调控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经常造成“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这当中,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比如政府角色的“错位”“越位”,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和行政审批过多过细,行政干预较多,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反而不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与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漫长艰难的探索过程,前进的关键在于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历史留下的一系列课题难题,等待着后来人的智慧和解答。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治理实践,向未来提供了诸多启示。

比如,如何把握“管而不死、放而不乱”的度?答案就在“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等创新性宏观调控方式中。由“强刺激”转向“微刺激”,由“一刀切”转向“定向调控”,由“遵循规则”转向“相机调控”,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由“急刹车”改为“点刹”,并注重适时适度的微调预测,提高了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跳出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再如,如何界定宏观调控的边界?答案就在政府角色和职能作用的日益明晰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政府的五大职能,宏观调控居首,而且只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应履行好“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些界定表明,宏观调控不能包办一切,在资源配置上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市场体系建设上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又如,如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答案就在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如果一味刺激需求,短期兴奋后只会积累更多风险,让经济越来越糟。高质量发展要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让经济发展不出现大的

起落,结构性调控是“治本良方”。

总体而言,坚持“宏观调控有度”,与建设“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推进“依法行政”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结合起来,提高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更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经济治理能力。一方面,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运行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为深化改革创造了平稳秩序和宽松环境;另一方面,调控体系本身不断完善,法治思维、市场力量灵活运用,多种经济治理手段协同发力,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新旧增长动力转换接替,实现了“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我们应当深入总结和思考这5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特点,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新要求,持续创新宏观调控,不断完善经济治理体系,防范“黑天鹅”“灰犀牛”等各类隐性风险,推动中国经济过好发展方式关、经济结构关、增长动力关,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 (四)

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开阔的眼界、思路和胸襟,在多个外交场合强调,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从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思想,从坚持对话合作、坚持互利共赢的交往新路,到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真抓实干,中国充分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耗尽,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面对萧条,一方面各国通过实

施宽松货币政策等刺激措施推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经济衰退引致国内就业、贫富差距等矛盾激化,进而造成国际关系相对紧张。但事实证明,无论简单的政策刺激,还是地缘政治冲突,都无法带来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动力。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带去了“中国经验”。“我们要创新发展理念,超越财政刺激多一点还是货币宽松多一点点的争论,树立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思路。我们要创新政策手段,推进结构性改革,为增长创造空间、增加后劲。我们要创新增长方式,把握好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既应对好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带来的挑战,也化解掉信息化、自动化等给就业带来的冲击,在培育新兴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过程中注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各国人民重拾信心和希望。”

这一主张是令人信服的。近几年,中国宏观调控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取得的亮眼成绩,与西方宏观调控的效果形成鲜明反差,也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只关注总量调控而忽视了结构调控,才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宏观调控不仅要关注总需求,还要更多关注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量和供给侧管理措施。这些结论,恰恰与中国的实践不谋而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新范式,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缺陷;中国的经济治理道路,为丰富和发展宏观经济治理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世界正在从与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红利”,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共享“思想理论红利”。

写入历史的辉煌成绩,莫不源于照亮时代的思想光芒。新时代的大门已经推开,广阔的未来等待着新的书写,经济战线要更加努力地学习、研究、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治理思想精髓,全面科学地分析、认识中国国情和历史条件,更加自觉地掌握运用规律,学习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为推动中国经济跨越关口、建设更有活力更有秩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